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于中西文化的文学批评理论创新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Critical Theoret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陈红薇 (Chen Hongwei)

内容摘要：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创始人，聂珍钊教授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一文中从伦理选择、脑文本、伦理与审美、文学的伦理功能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要旨，不仅指出了当代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基于伦理选择的文明三段论、基于脑文本的文本观、基于伦理教诲的文学观，构建了具有时代意义和中国特色的文学研究新方法和话语批评新体系，重新解释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弥补了西方文本理论的缺憾，解决了伦理与审美的争论，并以跨学科的伦理视域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新疆域。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批评；批评新方法；话语新体系；理论创新

作者简介：陈红薇，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戏剧和文学伦理学研究。

Abstract: As the founder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Nie Zhenzhao systematically expatiated its main theoretical points in "Value Choice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four aspects of ethical choice, brain text, ethics and aesthetics and ethical function of literature. He not only pointed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western ethnic criticism, but also innovatively put forth the theoretical views of civilization syllogism based on ethical choice, textual theory based on brain text and literary criticism based on didactic function, thereby constructing a new method of literary study and discourse system with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not only reinterpre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make up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western text theory, but also settle the argument about ethics and aesthetics and expands the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of literary studies.

Key Wor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new theoretical method; new discourse system;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uthor: Chen Hongwei,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She is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drama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chenhongwei@ustb.edu.cn).

自 2004 年聂珍钊教授发表《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以来，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在继承中国道德批评传统和借鉴西方伦理批评的基础上，构建起了不同于西方伦理批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话语体系。作为此理论的创始人，聂珍钊教授在 2020 年第 10 期《中国社会科学》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一文中，立足当下时代，从伦理选择、脑文本、伦理与审美、文学的伦理功能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要旨，不仅指出了当代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伦理选择为核心的文明三段论、以脑文本为基础的新文本理论、以教诲为单一功能的伦理文学观，构建起了具有时代意义和中国特色的文学研究新方法和话语批评新体系。

一、基于文明三段论的伦理选择理论构建

如聂珍钊教授所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之所以能够在西方伦理批评思潮衰落之时脱颖而出并迅速发展，其原因是它围绕伦理选择，创建了一套文学伦理批评的话语体系，从而将文学伦理学批评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理论方法。

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由自然选择、伦理选择和科学选择三个阶段构成（聂珍钊 王松林 1）。伦理选择阶段是我们生活的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它不仅决定着如何做人的大问题，同时也决定着人类在未来是继续为人还是成为科学人类（后人类，新人类）的大问题。伦理选择不仅是人类伦理选择阶段的核心，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基础（聂珍钊 王松林 2）。

人类学家利奇（E.R. Leach）曾说过，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性 / 兽性”（Humanity/Animality）构成了一个永恒精神家园的“迷思”（转引自彭兆荣 91）。在文学伦理批评中，聂珍钊教授引入了斯芬克斯因子和女娲因子（伏羲因子）的概念，以阐述人性中人与兽、善与恶的同体和冲突，并指出伦理选择的本质即是做人的选择（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 73-75）。

作为人类生存经历的反映，文学在本源上是道德的产物（聂珍钊、王松林 7）。在文章中，聂珍钊教授通过举例荷马史诗和仓颉造字，有力论证了文字和文本的价值在于宣教明理。在谈到希腊神话时，阿姆斯特朗曾这样评述希腊神话的伦理本质：神话故事讲述神灵的行为，并非是因为它们有趣，而是要让人来模仿，体验其神圣性（249-250）。在悲剧盛行的古雅典，每个公民都会去观剧，希腊人把诗人视为教师，而诗人则是把道德伦理隐伏于剧中，将审美聚焦于对精神的表现，所以希腊戏剧的目的不是娱乐，而是像欧里庇得斯所说，是“教他们想，教他们看，教他们领悟，教他们思考”（转

引自罗念生 115)。

其实，文学的伦理起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中西文本，如《吉尔伽美什史诗》和中国神话。作为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文本，《吉尔伽美什史诗》讲述的是城市的缔造者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收服乡村的麻烦制造者恩奇都并成为挚友的故事。在故事中，他们一起杀死了看守森林的神兽，因此招来众神的惩罚。在通向阴间的路上，吉尔伽美什遇到了大洪水仅有的幸存者乌特纳匹什提姆和他的妻子，他们能幸存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洪水的警告。该史诗的核心即是警示：“一场大洪水会抹去这个建立在泥土之上的文明赖以存在的一切”（普克纳 59）。史诗最后，吉尔伽美什带回了来自大洪水之前的信息，并将它刻在了石碑上。吉尔伽美什可谓是所有故事讲述者的化身，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希腊悲剧中的奥狄浦斯、《古舟子》中的水手、《白鲸》中的以实玛利和《蝇王》中的拉尔夫的影子。这部巴比伦史诗后来通过苏美尔抄写员的楔形文字泥板书被传承下来，并在几百年后在犹太抄写员的手中，被改造成了犹太人的希伯来经典。在犹太文本中，《吉尔伽美什史诗》的道德警示最终通过上帝的十诫和立约，被固化为了不可违背的诫命（普克纳 55-81）。

相比之下，中国文学起源的伦理性更加明显。中国神话文学就是一部教诲先民的伦理之书。据《韩非子·五蠹》所载，上古之世，人如野兽，饮血茹毛，穴居野处。中华民族圣人祖先们以伦理教化将初民与兽拉开了距离：燧人氏“以火为德”，“教人熟食”（《太平御览》卷十八）；巢氏作“构木而巢”（《路史·前纪五），使人住有所居；伏羲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帝王世纪》辑本），定姓氏制嫁娶之礼，开启“同姓不婚”的人伦；女娲“乘伏羲制度”，以补天义举整顿宇宙秩序。此外，还有神农炎帝教人“公耕而食，妇织而衣”（《庄子·盗跖》）。纵观中国古代神话文学，伦理道德可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文学因人对道德伦理的需要而发生，又以伦理教诲的作用而发展。在此过程中，人因选择伦理而成为真正的人，社会因选择伦理而演绎为共同体的文明。

二、基于脑文本概念的新文本理论

文学伦理学批评对文学批评的第二个贡献是脑文本（brain text）理论的提出。迄今为止的文本理论非常丰富，但却多被文本的思维定式所束缚，仅仅关注文本的物质存在，而忽视了物质文本的本源形态，即脑文本。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文本的三种形态，同时还提出了脑文本为一切文本之源、是文学实现其教诲功能的基础这一文本观。

除了圣哲辈出的“轴心时代”，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像 20 世纪后半期那样涌现出如此众多的理论争鸣，而文本是核心理论概念之一。在后现代

思潮作用下，巴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无数理论家从不同的视角对文本进行了定义，但不论他们的界定有何不同，它们均表现出一种共通性，那就是，认为文本是一种互文性的存在。所以，当代理论家对文本的研究多聚焦于它的文本间性上。对此，聂珍钊教授明确指出，文本理论不应只停留在语言、符号与文本间关系的表象上，而要挖掘表象其后的本原存在，即脑文本（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80）。

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文本观，文本有三种形态：以大脑为载体的脑文本、以书写材料为载体的书写文本、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电子文本。在这三种文本中，脑文本是最独特的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因为就介质而言，脑文本是一种生物的形态，一种“存储在人的大脑中的文本”，因此它是其他文本出现之前的第一形态和深层存在（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79-80）。但另一方面，脑文本又是依赖于其他物质文本的存在。由于脑文本是以人的大脑为介质保存的记忆，所以它是一种私有的存在（private property），不仅不能遗传，而且也只有通过其他文本形态，才能实现其文本的表达，实现与他人的共有或共享（聂珍钊，“论脑文本与语言生成”115）。

鉴于这种特性，脑文本相比于与其他文本形态具有三种独特的作用：首先，作为决定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既定程序，脑文本是一种原始文本，是其他文本出现之前的先在文本；其二，不论是书写文本，还是数字文本，要发挥其教诲功能，都需要通过脑文本来实现。脑文本类似计算机的应用程序，既是人的思想聚集地，也是主导人作用于行为的指令。所谓阅读，是读者通过大脑将阅读信息以思想概念的形式在脑中消化和存储，而后形成脑文本，它将决定人进行何种伦理选择；其三，脑文本不仅是文学实现其教诲价值的终点，也是作家文学创作的起点。在写作之前，作者在意图驱动下首先形成脑概念，并以先在文本的形式将其存在大脑中，而后再通过口头或书写表达出来（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27）。

在文章中，聂珍钊教授重点阐述了脑文本与口头文学的关系。他提出，从性质上讲，人类早期的口述文学不是文学实体，而是用口头表达的脑文本。因此只有从脑文本入手，才能分析口头文学的发生、流传以及从口头到书写的文本化过程（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29）。普可纳也曾说过，自人类学会用声音沟通以来，人类就一直在讲故事——故事保存了人类的经验，告诉听者该如何行为。《吉尔伽美什史诗》、荷马史诗、《摩诃婆罗多》、《犹太人圣经》、西非史诗《桑介塔史诗》无不是如此。所有这些故事最初都不是书写文学，而是口传故事，它们以脑文本的形式存储在游吟诗人的脑中，并表演唱给听众。为此，诗人们必须准确地记住这些故事，并在老死之前将故事传给后人。在整个口述时代，口传文学都以脑文本的形式存储在诗人的脑中，说故事就是背故事，如盲诗人荷马背诵传播希

腊史，中国藏族艺人背诵史诗《格萨尔王传》，脑文本是早期文学得以传承的途径。口述文学在人类早期民族共同体构建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古希腊，诸神故事经口口相传在希腊人中耳熟能详，它们所承载的道德寓意被听者内化为脑文本，从而改变人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引导他们在行为中进行自我选择。当这些故事被全民在思想上内化、吸纳，进而成为他们共同的脑文本时，神话便成为了这个民族共同的集体文化意识。

三、基于伦理教诲功能的伦理批评文学观

文学伦理学批评对文学批评的第三个贡献是对文学性和文学功能的重新阐述。它从伦理的立场，不仅重新探讨了文学的起源和创作，指出文学的本源是伦理表达，文学的创作机制是脑文本的构建，同时也提出了文学的价值是在审美过程中实现其教化功能的文学观，从而厘清了教诲与审美的关系，解决了文学批评中的教诲功能与审美功能之争。

首先，在文学性问题上，文学伦理学批评不赞成现代科学分类视域下的狭义文学观，主张将文学回归到中国古代人文的文学概念中，从广义的范畴来定义文学（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85）。为此，聂珍钊教授在文章中以甲骨卜辞与四书五经分析为例，论证了它们在建立伦理规范上的一脉相承。作为中国现有最早的文本实物，卜辞由占卜和刻辞两部分构成：前者旨在确认行为是否符合天道伦理，后者则是以契刻记录天道神意，由此建立伦理规范。事实上，甲骨卜辞所反映出的以“契刻”来固化伦理规约的现象在西方典籍中也非常普遍。希腊神话中的神谕、德尔斐神庙的铭文、《圣经》中的十诫无不是通过文字来规约行为的佐证。在《圣经》中，规约的建立经历了从口头讲述到文字契刻的过程。在《圣经》中，道德规约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它直接来自上帝：最早是上帝口头上禁止亚当、夏娃食用智慧果子，后来上帝又以洪水和彩虹为载体与诺亚立约，但真正使规约成为世人行为法则的，则是摩西从上帝手中接过的“契刻”规约。如普克纳所说，上帝最初在云中与摩西对话，将选民们遵守的律法口授于他——这是一个口述的规约，后又给予摩西一块刻字的石板，即十诫。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摩西因族人堕落而怒摔石板，上帝再次呼召摩西，重复了诫命，他吩咐摩西：“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照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转引自普克纳81）事实上，《摩西五经》中详细记载了上帝犹太人的各种教导和律法。普克纳认为，《圣经》中关于石板刻戒的细节非同寻常，先是上帝本人成为了规约的书写者，后是摩西成为了对诫命的刻记者。与此相似，在古凯尔特文明、玛雅文明、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中，文字的刻写者也都被赋予了如祭司、占卜者等通神的能力，其书写被视为带有神命与天命的深意。

卜辞的教诲功能在后期的四书五经等文学典籍中得以传承。虽然这两种文类形式不同，但殊途而同归，前者注重以占卜定天道、以契刻建规约，后

者则是采用直接的说教教诲规约，儒家经典即是“做人的道德经典”（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88-90）。关于这一点，叶舒宪先生也从神话学的角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儒家文本追求的是三段式的人格理想：俗人（小人）—君子—圣人。汉字“聖”的写法表明，圣人是经“口耳”会意而来，而《论语》中的“论”和“语”也皆从“言”字，突显了儒家以言说建礼乐仁义的心志。因此，在叶先生看来，儒家文本的核心是‘内圣外王’说，即通过礼乐教化式的学习和修身，走向君子和圣人之境。

聂珍钊教授不仅在文章中澄清了文学性问题，同时还主动回应文学批评中的教诲与审美之争，明确指出文学的目的是伦理教诲，从而回答了文学的功能性问题。事实上，教诲与审美之争历史悠久，它是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蛙》的核心主题，通过剧中人物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论证得以呈现。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在形式上是文本的艺术，但在本质则是伦理的表达（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82）。由于审美是人的主观判断，因此审美在性质上是主观的，所谓“审美”必然是先有“审”（判断），才有“美”，因此伦理是第一性的，审美是第二性的，审美是实现文学伦理价值的途径，而非文学的功能（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85），用埃斯库罗斯在《蛙》中的话说：“为了表达高尚的思想和理性，必须创造出高尚的语言”（107）。

为实现教诲目的，文学在艺术手法上会采取不同形式，如中西方文学中的“瘟疫”和“灾难”叙事。希腊文学发轫于《伊利亚特》，而《伊利亚特》则始于瘟疫：希腊人俘虏了特洛伊祭司的女儿，祭司祈求赎回女儿，遭阿伽门农拒绝，太阳神便降瘟疫于希腊军队。此外，还有《俄狄浦斯王》中的瘟疫、《出埃及记》中的“十灾”、《窦娥冤》中的三年大旱等。聂珍钊教授曾说过，在人类文明之初，构建伦理秩序的核心是禁忌，禁忌是伦理秩序形成的基础和保障。文学的目的是将禁忌文字化，使不成文的禁忌变为成文的伦理（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伦理与术语”18）。当谈到希腊悲剧中的灾难主题时，人类学家韦尔南说：剧中的人物是和你、我一样的人，他们陷入灾难是因为在特定的时刻犯下了错误（145）。在以上所提作品中，人物无不是违背“大道”而造下罪孽，其结果如《阿伽门农》歌队中所说：“作恶者必遭报应，这是天理”（埃斯库罗斯 366）。而解除灾难的唯一办法是把清除“污染”和“不洁”，《阿伽门农》悲剧发生的原因是“污染”无法清除：“谁能把诅咒的种子从这家抛弃？这个家族已和不幸紧密相联系”（366）。把恶人逐出社会是上古刑罚的原始意义和机能，所施对象被视为“不洁”（臧克和 385）。很多瘟疫文学都是通过“犯罪——降灾——诊断过失——审判——赎罪”的叙事，达到传递伦理教诲的目的。在希腊时代，所有人都知道这些神话故事，但每次观看悲剧，人们都会再次内化其“大道”，形成影响其行为的脑文本和伦理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十日谈》中描写的通过讲故事

躲避“瘟疫”并非只是故事，也是文学伦理性功能的表征。

结语

自2004年聂珍钊教授首次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到2020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一文的发表，历时十六载，文学伦理学批评立足中外文化和理论的互鉴，创造性地构建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和话语体系，不仅是对西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极大丰富，也是对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重大创新。

Works Cited

- 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张竹明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
[Aeschylus: “Agamemnon.” *Complete Works of Ancient Greek Tragedies and Comedies*. Trans. Zhang Zhuming et al., Nanjing: Yilin Press, 2015.]
- 凯伦·阿姆斯特朗：“叙事的神圣发生：为神话正名”，叶舒宪译，《江西社会科学》5（2008）：249-254。
[Armstrong, Karen. “The Sacred Occurrence of Narration: Rectification of Name for Myth.” Trans. Ye Shuxian.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5(2008): 249-254.]
- 罗念生：“古希腊罗马文学”，《罗念生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Luo Niansheng: *Literature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In *Complete Works of Luo Nianshe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
- 马丁·普克纳：《文字的力量》，陈芳代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
[Puchner, Martin. *Written World*. Trans. Chen Fangdai. Beijing: CITIC Press Group, 2019.]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伦理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20）：12-22。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10): 12-22]
- ：“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5（2017）：26-34。
[—,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Brain Text and Brain Concept in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2017): 26-34]
- ：“论脑文本与语言生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6（2019）：115-121。
[—, “On Brain Text and Language Generating.”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6(2019): 115-121]
-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205-206。
[—,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2020): 71-92+205-206.]
- 聂珍钊、王松林：《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Nie Zhenzhao & Wang Songlin.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20.]

彭兆荣：《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Peng Zhaorong. *Literature and Ritual: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Beijing: Beiking UP, 2004.]

韦尔南：《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

[Vernan, J. P. *The Myths and Religions in Ancient Greece*. Trans. Du Xiaozhe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1.]

叶舒宪：《金枝玉叶——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年。

[Ye Shuxian. *The Golden Bough Vs the Jade Leaf: A Chines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Mythology*. Shanghai: Fudan UP, 2013.]

臧克和：“法原刑始”，《神话——原型批评》，叶舒宪编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385-401。

[Zang Kehe. “The Origin of Law.” *Myth-Archetype Criticism*. Ed. Ye Shuxian. Xi'an: Shanxia Normal UP, 2011. 385-401.]